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⑨

葫芦烙画



苏海峰携带作品参加展览活动。

【一言】

让传统活在当下才能确保它拥有未来

□范永

民间艺术家苏海峰探索的非遗传承之路为非遗技艺找到了新的出口。他尝试打造“非遗+”品牌,发展多品类的葫芦烙画产业,以此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其通过“网络+线下”销售的方式,带动更多人通过葫芦烙画产业增加收入。

让传统活在当下,才能确保它拥有未来。这门曾游走于市井巷陌的民间艺术,必须经历一场品牌化带来的市场化深度蜕变,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葫芦烙画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传说与刘秀有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葫芦烙画始自唐代,成于宋代。唐朝出现其技艺雏形,宋朝时工艺逐渐成形。但实物及文献资料留存有限,导致其技艺一度失传。清朝康熙、乾隆年间,葫芦烙画技艺达到高峰,成为皇家御用珍品,因乾隆帝、纪晓岚推崇而广布民间。

葫芦烙画在历史上所走过的辉煌之路似乎不可复制,今天需要依靠品牌化重塑赢得市场青睐。而这种观念转变绝非简单的商业包装那样简单,它需要一场关于文化基因存续与再生的全新实践。

品牌化重塑的关键是,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如何体现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以及引入现代人的技艺和运营方式实现市场转型。运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传统元素,使古老艺术获得当代表达空间,最终形成“商业反哺技艺—技艺增值品牌”的良性循环。

故宫文创模式证明,当文化记忆转化为生活美学时,传统便获得了永恒的现代性。如通过建立非遗工坊2.0模式,设计“前店后坊”的体验空间,让游客实现可参与从选葫芦到烙制的全流程体验;通过教育IP化开发,打造活态传承矩阵;通过时尚联名,与服装设计品牌合作开发“可穿戴非遗”系列。

这种品牌化路径将传统工艺转化为可感知、可设计、可消费的文化体验,在商业价值实现中可以获得更丰厚的“文化兑现”。

传统葫芦烙画承载的“福禄”寓意,曾是其最鲜明的文化胎记。而现代品牌构建却需要更宏阔的实现维度。当山东某工坊将《清明上河图》烙于葫芦,当江南匠人用烙笔再现敦煌飞天,我们看到传统纹样在当代审美设计中的华丽转身。

品牌化不是对民俗符号的廉价消费,而是以设计语言重构文化记忆。葫芦烙画的品牌化实践揭示出非遗传承的辩证法:真正的文化新生不在博物馆的恒温展柜中,而是在市场浪潮的拍打之下。

烙铁代笔火为墨 葫芦烙画绽新颜

□本报记者 郝懿 见习记者 李浩



苏海峰挑选葫芦。

在工作室里,苏海峰轻轻按下电烙铁的开关,仔细调节温度后,开始了艺术创作。托起一个葫芦,手腕轻转,电笔在葫芦表面游走,如同画家执笔作画。随着温度的变化,深浅不一的烙痕渐渐浮现,勾勒出山水的轮廓。不一会儿,葫芦上便呈现出一幅精致的山水画。整个过程,他凝神屏息,仿佛与手中的葫芦融为一体,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意境之中。

为更好地掌握这项技艺,苏海峰不仅沉潜自修,还先后前往北京、辽宁等地拜访葫芦烙画艺人,向他们请教学习。作为一名残疾人,他在肢体残疾的情况下一直深耕葫芦烙画技艺,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苏海峰妻子说:“他每天投入在创作上的时间至少四五个小时以上,有时候创作灵感来了,他甚至会一晚上不睡觉。做

诗经中有“瓠有苦叶,济有涉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的句子,其中瓠、壶都是指葫芦。葫芦本色就有古画的基调,而且与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联系紧密,在古代传统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围绕葫芦所形成的种种意识形态,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葫芦文化经历长期的历史积淀,以其独特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葫芦上绘就美丽图画,线条流畅准确,形态栩栩如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不媚不俗的感觉。作为一种集纯朴自然和高雅精美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品,葫芦烙画作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结缘葫芦烙画20余年,苏海峰创作了上千件葫芦烙画作品。他创作的《岁月静好》葫芦

为墨,在葫芦上作画的古老民间技艺。葫芦烙画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艺术风格,烙画艺术家用烙铁在葫芦上烙出烙痕作画,烙痕与葫芦融为一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创作中的苏海峰。

历史悠久 特色鲜明

葫芦烙画相传起源于汉代,后一度失传,清朝时开始复兴。清代兰州的刻制葫芦曾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为朝廷贡品。当时采取的火烙工艺将葫芦的木质材料与中国传统的烙画技艺相结合,在葫芦的木质表皮上,采用国画的工笔、写意等艺术手法,以烙铁代笔,创作出人物、山水、花鸟等作品,成为当时社会大众争先收藏的艺术品。

葫芦烙画艺人在创作中注意火候、力度的同时,还形成了“意在笔先、落笔成形”的创作理念,这要求创作者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很强的创作能力。艺人可熨烫出丰富的层次和色调,还可采用中国画中的勾勒、白描、点染等手法使葫芦烙画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因此,葫芦烙画作品既能保持传

千锤百炼 久久为功

这个东西非常耗费眼睛,我有时候都是强制他休息。”

要想创作出好的葫芦烙画作品,前期准备工作必不可少。创作者首先要选择好的葫芦种子在温室里种植,温度要控制在28—33摄氏度之间,葫芦种子在温室里长出四片叶子时,方能移植到大田种植。生长期,要进行绑结、施肥一系列流程,待寒露时节葫芦皮发白时才可采摘。之后,还要对葫芦进行阴干、打皮、风干等操作,方能得到一个好好的葫芦。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光一个风干的过程,就要持续半年之久。上述流程全部完成后进入创作阶段,可能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苏海峰说。

进入创作阶段,一个精致的葫芦烙画成品要经历起稿、勾线、晕染、细节处理等环节,

这个过程耗时耗力,非常考验创作者的耐心。

起稿阶段,创作者首先要绘图,根据创作需求在纸上绘出图样,这一步也叫打样。绘图过后,创作者会将纸上的图样在葫芦上进行简单勾勒。勾线到晕染的中间过程是最为复杂的,创作者要将勾勒在葫芦上的图样按照创作需求进行深加工。

“这个过程是非常耗费心血的,葫芦各部位的皮质硬度是不一样的,所需电烙铁的温度也是不一样的,从几十摄氏度到几百摄氏度不等。眼睛也需要紧盯着创作的部分,哪部分需要什么样的温度、需要电烙铁烫到什么程度,这些都需要心中有数、谨慎操作。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天甚至几周时间。”苏海峰说,他的眼睛长期充满血丝,眼球也常常肿胀难

前景光明 传承有力

烙画作品,以他曾经工作的地质勘探队为原型,图中源头钻井架、帐篷、野草、天空等景物一一呈现。作品通过黑白对比的方式展现地质勘探人的工作场景和精神,以此来纪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件作品他花费了两周的时间去创作,作品问世后,许多人都爱不释手,希望花高价收购。苏海峰不以为动,他最终将这件作品捐赠给了原单位。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葫芦烙画的艺术魅力,苏海峰先后带着他的作品前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参加各类展会,并且借助当地社会组织在各地参展销售,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在推进作品商业化进程的同时,苏海峰的葫芦烙画技艺传承之路也没有落下。他曾经受聘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培计划“2019年度乌海烙画培训班”授课教师,为学员传授葫芦烙画技艺。同时,他入驻海



苏海峰传授制作技艺。

勃湾区千里山镇新和社区申报获批的“自治区非遗传承教育培训实践基地”,传授葫芦烙画技艺。

近几年,苏海峰培训了上百名学徒,其中8名学徒的葫芦烙画成品已经上市销售。2023年以来,苏海峰与当地社区沟通,尝试打造“非遗+”品牌,发展多品类的葫芦烙画产

统绘画的民族风格,又可达西洋画严谨的写实效果。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葫芦烙画技艺也在迭代更新,可以控制温度的电烙铁代替了传统的铁烙铁。相比传统的葫芦烙画作品,当下的葫芦烙画作品呈现出焦、黑、褐、黄、白等多层次的国画渲染效果,表现力更加丰富。

可以说,当一个普通葫芦披上烫画的外衣,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一个个精致的葫芦不仅承载着烫画技艺,也蕴含着画师的良苦用心。

苏海峰今年50岁,他潜心钻研葫芦烙画技艺二十余载,创作出上千件精美的葫芦烙画作品。2022年4月,他被自治区文化与旅游厅评为“2022年农村牧区文化示范户”,成为乌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民间艺术家。

受,这些都是他长期伏案创作造成的。

葫芦上的图案经过艺人的深加工后会进行晕染。艺人通过电烙铁的温度与自身的手速配合,一般以低温为主,进行多遍晕染。晕染后的葫芦通体光滑且具有色泽感和层次感。晕染过后,艺人会对自身创作不满意的地方进行细节处理。

“这一道环节必不可少,我们创作作品,就要做到自己最满意的样子。细节处理可以更为细致地修改创作中遗留的小瑕疵,为未来创作更好的葫芦烙画作品打下更好的基础。”苏海峰说。

20余年来,苏海峰创作的葫芦烙画作品深受社会大众的好评。他创作的《花开富贵》《春趣》《岁月静好》等葫芦烙画作品曾在国家级展览中获奖或被一些单位收藏。

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并通过“网络+线下”销售的方式,带动更多人通过葫芦烙画产业增加收入。

烙铁代笔火为墨,葫芦做纸绘福禄。铁为笔,火作墨,葫芦烙画在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下,展现出非遗之美、历史之美,这也是对民间技艺传承和发扬的最好告慰。

【见证】

文庙:北疆地区儒学传承的载体

□孟荣涛

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庙,是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也被称为孔庙。因孔子被尊为儒家代表,文庙自然成为践行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历史上各地区推进官学发展的重要场所。北疆地区的文庙既是儒学传承的重要载体,也肩负着推进我国北部边疆文化教育的历史使命。兼具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文庙,充分彰显出儒家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生动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互鉴的动态变迁过程。

内蒙古地区曾有十余座文庙建筑,现仅存位于土默特学校校园内的土默特文庙,学校旁边的街道得名文庙街并沿用至今。土默特文庙是清廷在内蒙古地区最早修建的文庙建筑,从而使儒家文化、崇儒重教之风在北疆地区传播、盛行。

据《敕建文庙碑记》记载,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在长达20年的任职期深受民众爱戴,感恩的百姓们捐款捐物想为他修建生祠,丹津谢绝这一提议后上奏朝廷请求以中原地区所建文庙的规制,在归化城修建土默特文庙并兴办官学。“皇帝洞鉴其诚,照所请准行”,1724年文庙建造完成,1726年创办土默特官学。1735年,钦差大臣通智奏请雍正“动用帑金,并诸公捐贖”后,按照孔庙规制对文庙进行了重修。通智广泛选拔人才、予以官衔,为他们提供了晋身之机,并获准由官学考拔优秀者并授为九品笔帖式,学子们除了被选为本地之章京、笔帖式外,更优者还被举荐到京城任职。北疆地区年度春秋仲月祭祀孔子的礼仪由土默特蒙古都统主祭,全旗参领、佐领等人及官学学生悉数参加,祭祀活动肃穆、隆重。

土默特官学所用多元语文的儒学教材由清廷钦定或编订,并以规范化标准编订祭祀孔子的礼仪并推广练习,所培养的人才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桥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庙成为“设满洲、蒙古教习,教众人之子弟”的唯一场所,促进了文化教习制度和官员选拔体系的融合,同时也加强了朝廷对北疆地区的管理。悬挂于文庙的康熙和雍正所题匾额“万世师表”“生民未有”,彰显出皇帝对北疆文教发展的厚望。

文庙在儒家文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官学和书院的融合,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庙学合一”即“庙学”现象,影响并推动着我国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随着北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日益增多,1739年建立绥远城官学,1781年起土默特文庙新设汉官学,1886年土默特官学更名为启运书院,1904年启秀书院更名为绥远城中学堂,1907年更名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1914年更名为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该校培养出以乌兰夫、布赫、云布龙为代表的优秀人才,有力推动了内蒙古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土默特文庙分左、中、右三门,正门在泮桥之北,中门称泮宫,主体建筑大成殿的东西两侧各有三间配殿,后面还有三间崇圣祠,虽经多次修缮,但始终保留着传统建筑布局和规制。

汉代以来,文庙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理念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交融的象征。不断发展、壮大的封建王朝,文庙建设也随即延伸至边疆,这不仅是儒家文化融入边疆地区、浸润边疆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化认同深化政治认同,连结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纽带。文庙及其建设体系、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而不同”等理念,奠定了边疆地区坚实的文化基础,在维护国家统一、保障边疆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意义重大而深远。